

## 《馬可波羅與發現世界》

藍美華 譯

(本會現況研究委員、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副教授)

這是本厚書，有時挺難讀的，但卻非常值得一試。當然，這是本關於書的書，關於一本偉大但具爭議性的書，它沒固定名稱，不過在世上非正式地以《馬可波羅遊記》一名著稱。《馬可波羅與發現世界》的作者是來自英國的耶魯大學退休教授，顯然是個地理歷史學者，沒有中國或蒙古研究的背景。如此一來，那些對馬可波羅及長久以來馬可的真實性和相關性爭議感到興趣的讀者究竟可以從本書得到些什麼？本書對於《馬可波羅遊記》文本的建構、150份失落或存在的不同版本的來源、作者的觀點（整理得相當好）等方面都有詳盡的研究。本書作者認為：「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帶給西方如此鉅量的地理新知。」（頁1）

拉爾諾宣稱，重點不應是馬可波羅的遠東之行，而是這個威尼斯人把自己在亞洲的經驗寫成中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最終替歐洲人探勘歐洲以外的世界創造了學術氣候。儘管馬可的書是否為傳奇或虛構一事被拉爾諾——尤其是十八世紀以來對此存疑的評論者——認真加以呈現及分析，他本人確實相信馬可波羅遊歷的真實性。拉爾諾承認，他寫這本書是因為他本身對馬可波羅以前和之後的人們如何了解世界地理感到非常好奇，他想知道這本書對地理家及探險者——尤其是哥倫布——有何影響。「我的主要目的僅僅在描述這本書如何誕生、作者寫作的目的以及該書往後的命運。」（頁5）

拉爾諾的著作始於一個引言的注釋。他把許多存留的文本分成兩大類：第一類〔A〕可以回溯到被稱為F的文本，作者相信這些是最早或最接近

1298年獄中所寫的原始文稿；第二類〔B〕數量頗少，但通常材料較完整，拉爾諾認為是A文本的重寫，並為特定有限的讀者做了補充及說明。但拉爾諾並未清楚說明為何這個文本必須是有限的。概論的最後兩頁以及附錄一進一步談及此一主題，有助於我們對馬可波羅文稿的翻譯和出版的理解。

第一章試圖對馬可波羅之前西歐對亞洲的了解做簡略的介紹。這或許是本書最弱的一部分，因為拉爾諾欠缺良好的亞洲史背景，以致內容過於簡化，並有一些誤解。舉例來說，作者提到成吉思汗出生時的名字叫鐵木真，斬釘截鐵地說「成吉思汗」意為「非常強大的君王」，宣稱忽必烈宮廷上使用的是波斯語，還說「有相當多關於蒙古的資料可以在西歐的文稿中找到。」（頁26）假如我們記得在成吉思汗興起前西歐根本沒有任何資料提及蒙古人，或許「相當多」是正確的形容詞！不過，作者在這一章倒是對義大利聖方濟會教士柏朗嘉賓（Giovanni di Pian di Carpine）的蒙古行做了很好的描寫（頁18-21），對法蘭德斯聖方濟會教士盧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ck）和林之行的書寫也有相當實在的評論（頁23-25）。這一部分成功的理由是因為這些教士原稿是以拉丁文寫的，而拉爾諾看來精通拉丁文。他對聶思托里教派教士騷馬（Rabban Sauma）與馬克（Rabban Mark）所寫報告的摘要（頁29-30），均是簡明而富於資訊的。然而，因為作者對於中國當代史料以及蒙古人歷史珍寶《蒙古秘史》相關知識的欠缺，使得他無法描繪出蒙古之前以及早期蒙古歷史的全貌。

拉爾諾的第二章是關於馬可的家族。他討論馬可、他的家庭、以及當時威尼斯的商人文化。他花了不少時間找出馬可家族訪問蒙古帝國的可能路線，並且相當著迷於解釋說，儘管書中旅行的其他細節是真的，但該書對於這些旅行期限的說明不可能是真的。對研究《馬可波羅遊記》的學者而言，

日期的確定是非常困難的。對於馬可在中國待了十七年後何時以及如何回到熱那亞並成了囚犯，一直有相當的爭議。儘管如此，拉爾諾並未被時間先後的問題所拖延。他相信，雖然馬可有關於傳奇東方的故事引發人們的驚奇與不信，但馬可一生中獲得相當的名氣。畢竟，在馬可 1324 年 1 月 8 日死後多年，有個故事被阿奎（Jacopo d'Acqui）記錄下來並收錄在友樂－柯笛爾（Yule-Cordier）的譯本中，該故事指出：「由於他的書中有很多偉大及奇異的事物，令人難以置信，他的朋友在其病榻前要求他加以訂正，刪除所有不是事實的東西；而他的回答是，他所說的沒有半件不是他親眼所見。」（頁 45）

第三章集中在馬可波羅與他獄友拉斯提撒羅·皮薩（Rustichello da Pisa）的可能關係。拉斯提撒羅被普遍認定是把馬可口述回憶紀錄下來的人，拉爾諾討論了他的背景以及他和馬可之間合作的本質。雖然《馬可波羅遊記》最初的獄中原稿並未保存下來，拉爾諾與其他研究者都同意原稿是用法文或一種法式義大利文（Franco-Italian）或法式威尼斯文（Franco-Venetian）的變體文字寫的。拉爾諾教授宣稱，馬可書中武士修辭的設計是受到了拉斯提撒羅以及當時文學習慣的影響。書中寫作往往前後跳躍、提起或丟下某些主題，而以「但我忘了說……」加以說明，這顯示此書是馬可根據自己的記憶和筆記口述給拉斯提撒羅的。但拉爾諾也承認，這也可能是有意的設計，因為這種寫法在中世紀的散文詩中是相當普遍的。這部分和整個第四章「此書的製作」充滿文學分析，顯示拉爾諾對西方中世紀語言、文學與文學批評深厚的背景，但對史家來說功用有限。在分析許多現有文本後，他下結論說，原文有兩個版本。（頁 58）不過，拉爾諾的解釋－B 版本充滿對非基督宗教的開放以及蒙古對宗教的容忍態度的描述，這在宗教裁

判的時代 ( the time of the Inquisition ) 公開的話是很危險的 ( 頁 58 )  
—僅僅是個假設，並無足夠的基礎或證據可以支持。

第三章的後面集中在討論各文本的真實性以及內容材料的可靠性，因為一直有人懷疑《馬可波羅遊記》是本小說，馬可也從未到過中國。最常被重複問到的是，為何書中沒提到長城、女人的小腳、繪畫、茶、儒家或道教等等？拉爾諾承認他被多疑的學者的問題所苦，這些問題包括誰是馬可？這本書是關於什麼？如何寫成？是騙人的東西嗎？他引用了李則芬 ( 1977 年 10/11 月在《東方雜誌》的文章，1982 年被譯為義大利文 )、海格 ( J. W. Haeger ) ( “ Marco Polo in China? Problems with Internal Evidence,” Bulletin of Sung and Yuan Studies 14, 1978 )、特別是伍德博士 ( Dr. Frances Wood ) (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London, 1995 ) 的疑惑。根據《馬可波羅遊記》各章中一長串的地名和地區，伍德博士相信馬可並未到過中國，祇是重複名稱而已，但拉爾諾卻認為，這種和暢的旅行路線正足以證明馬可是根據寫下的文件—可能是那些用於蒙古驛站的文件—所說的。但他並未解釋他這看法的由來。拉爾諾急切企圖反駁各種此書乃是假造的指控，希望平息這些疑惑。他對中國與蒙古歷史和社會習俗的無知對他妨礙頗多。然而，在第三章的結尾，他向讀者承認：「……對地理歷史學者而言，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不是作者，而是這本書。」 ( 頁 67 )

拉爾諾依舊認為，馬可的書不是冒險故事，不是遊記，也不是威尼斯商人關於亞洲商業的作品。馬可不是教士。「假如我們拒絕這本書的這些詮釋，那留給我們的基本上不過是一部地理作品罷了。」 ( 頁 77 ) 但這並非博托樂米 ( Ptolemy，譯註：古埃及的天文數學家，以希臘文寫作) 的地

理。拉爾諾對地理史的廣博知識讓他有能力將此書與當時的其他地理書籍加以比較，與馬可波羅之前或之後地理學者的著作相比較。第四章非常完整，但對非地理學者而言是很難讀的。下一章把《馬可波羅遊記》分成十個部分，作者簡略介紹了各部分的內容，企圖呈現「此書的最大力量在於它的組織」（頁97），但卻寫得很不容易閱讀。像這樣的還有作者離題時強調的、伊思藍（Syed Manzul Islam）在其書《從馬可波羅到卡夫卡的旅行倫理》（*The Ethics of Travel from Marco Polo to Kafka*）上提到有關亞洲人民的理論。假如編者更細心的話，關於這主題的七頁應該可以全部刪除才是。

比較有趣的是第六章對《馬可波羅遊記》各種文本的討論：誰擔任這些不同的翻譯？這些文本之間有多大的差異？這些譯者中究竟有哪些人相信該書的內容？根據拉爾諾的說法，在十五世紀中葉時，馬可的書已經存在三種主要型態：第一種是以法文寫的，收藏在上層權貴如法國國王查爾斯五世的圖書館中；第二種是從法文譯成的托思卡（Tuscan）或威尼斯文本，不是寫在昂貴的羊皮紙，而是寫在沒有插圖的普通紙上；第三種是積極想要說服讀者該書內容的真實性，通常是譯成拉丁文，寫在羊皮紙上，往往和其他作品如貴族（Ranulf of Chester, Gerald of Wales, William of Tripoli, Prince Hetoum）或教士（Odoric of Pordenone）的編年史合編在一起。後者為教會相關的翻譯，刪除了大多數的武士式修辭以及對非基督徒較友好的說法。這一種是替學者或神職人員寫的。

拉爾諾對《馬可波羅遊記》拉丁文本的評論替另外有趣的一章「馬可、商人與教士」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檢視了羅馬天主教團在忽必烈死後到各汗國的訪遊經驗。再一次，我們必須假設，拉爾諾對教會紀錄極富知識的評

論乃是來自他對拉丁文的掌握，使得這一章的前半非常生動，對讀者也很有啓發性。他僅在轉入他不熟悉的中國課題部分才遇到困難。舉例來說，拉爾諾忽略明朝皇帝排外的心態，而認為：「與其說是由於中國新統治者對外國人的仇恨，不如說是由於在十四世紀下半葉因為歐亞經濟困難導致彼此間的接觸中斷，也由於中國和蒙古草原在政治上的分離，〔而歐洲人必須〕透過此草原才可到達中國。」（頁 123）編者應該刪除那幾頁描寫義大利藝術中在印度的聖方濟會殉道者畫像以及《笛卡美榮》（The Decameron）一書中富於想像的故事。（頁 126-7）

拉爾諾書中的最後三章集中在人文主義時期、哥倫布和其他探險家的時代直至當代人們「對此書的接受」。（頁 2）拉爾諾相信，在十四、十五世紀之交是馬可波羅的書受到最多質疑的時候，因為當時與歐洲與亞洲的接觸中斷，而那些畫世界地圖的製圖者又對馬可書中提到的地名和人群不具知識。在《馬可波羅與發現世界》中附有十四幅彩色圖片，多數是中世紀的地圖，用來證明作者的理論。其中一幅關鍵的地圖是 1380 年的卡塔蘭地圖（the Catalan Atlas），它的確給了一幅以《馬可波羅遊記》為基礎的東方圖像，拉爾諾認為這幅地圖影響了很多歐洲探險者。不過，他提到後來有許多可供讀者自修的地圖，但卻未能反映馬可波羅及其旅行的相關知識。

拉爾諾教授相信，哥倫布在其第一次發現之旅（First Voyage of Discovery）前並未讀過馬可的書，但透過閱讀反映此書的地圖知道了馬可的經驗。雖然拉爾諾承認不可能在哥倫布的日記中找到任何證據證明哥倫布曾經直接讀過馬可的書，但在哥倫布紀錄的第四次遠征的注釋中的確提到馬可波羅的名字。（頁 159）諷刺的是，由於哥倫布及其後繼者的發現，加上印刷文字的傳播，馬可的書比以往更加流行。（頁 160）

哥倫布以後推廣馬可波羅最有功的當屬拉穆希歐（Giambattista Ramusio，1485-1557），他把這個威尼斯人當成英雄推到全世界，並且一按照拉爾諾的說法一把馬可的書從地理書轉變成馬可這個人神奇的冒險故事。事實上，拉穆希歐寫過，波羅家族是比哥倫布還偉大的探險家。但隨著馬可的日益耀眼，對他旅行真實性抱持懷疑的人也愈來愈多。拉爾諾率直地指出，一般而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學者不相信馬可的書，但義大利（當然！）和英國的學者則相信。隨著1540年代歐洲人抵達中國沿海，對馬可的敘述產生誤解的情形日增，因為馬可把中國地名以波斯文形式記下，使得多數海員完全不知道他們就身在馬可所描述的國家中。（頁168）此外，很難將馬可對中國內地以南許多地方和海島的描述加以對應，讓製圖者不相信並且不把《馬可波羅遊記》視為資料來源。終於，在十七世紀以後，這本書失去作為地理著作的影響力，而僅僅被當成娛樂性書籍。

根據拉爾諾，這種情形的例外是中國的天主教士在十六、十七世紀的作品；這些著作對馬可相當尊敬，這類教士中的一個就是耶穌會的俐瑪竇（Matteo Ricci）。接著，在十八世紀，隨著法國、西班牙和英國的殖民爭奪戰，馬可的書再次被批評在地名、緯度資料、距離和方位上不確實。但馬嘉理爵士（Lord Macartney）的使館在北京設立後，英國對該書的興趣隨之重生。就在這種氛圍中，由亨利柯笛爾（Henri Cordier）修訂的維多利亞時代蘇格蘭友樂（Yule）上校的《馬可波羅遊記》著名版本出現了。「從很多方面來看，友樂的版本是現今最讓讀者滿意的版本，因為書中一切彷彿仍在當時以某種方式存活著，而書中重製的大約170幅維多利亞時代有關亞洲的木刻更加強了此種感覺。」（頁180）

在拉爾諾適切題為「耶穌會會員、帝國主義者與結論」的結論中，他寫

道，馬可波羅「給歐洲一部作品，成為往後幾世紀發現世界的有利因素。」（頁 183）儘管或許有些學者仍不同意此觀點，《馬可波羅與發現世界》確實為此一前提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拉爾諾宣稱，如同當時很多其他的地理著作，《馬可波羅遊記》被看做是一本充滿驚奇的書。對作者而言，這本書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時代降臨後才進入全盛期，被學者和製作地圖的人熱烈地研習著。「這是這本書最顛峰的時刻。」（頁 181）拉爾諾宣稱，即使看來哥倫布在首次遠征前並未讀過此書，他也不需要讀，因為「在當時其內容已成為心理氛圍的一部分……」（頁 181）馬可波羅著作今日的命運又如何呢？拉爾諾回答說，儘管此書在某些方面被視為傳奇或故事，但它依舊是地理史上的標竿，反映了馬可波羅相當神秘的個性，也替世界打開了亞洲廣闊的天地。

我必須承認，本書的三個附錄對讀者很有幫助。如前所述，附錄一是有關各稿本的演變。附錄二涉及書中提到的時間和距離，拉爾諾很關心這個，因此花費很多精力在這些計算上（雖然看來似乎白費工夫）。附錄三很詳細地解釋十五世紀以來的主要世界地圖，製圖者應該特別感到興趣。拉爾諾還費力地做了很好的學術註解，對書中討論到的各項歐洲研究的主题感興趣的研究者，均能從中獲得指引。讓人印象更深刻的是十八頁的引用書目。最後，這書的索引很不錯。